

評論

文學·人類學：從《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借鏡
「文本感知力」

劉斐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人類學家向來是以田野蹲點輔以文獻研究，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而其訴求莫不在於既能呈現文化現象，又能深掘現象的根部，找出社會結構、情感意緒、道德追求、價值依歸、美學的超越，乃至個人在承載與體現文化的同時，如何抒發胸臆，建構個人的認同與社會歸屬。然，無論是「呈現」抑或「深掘」，都會涉及文本，或是文本的書寫，或是文本的閱讀。而這兩者，正是文學人類學的主要意趣：一則是關乎人類學家如何將研究所得的文化知識，透過各種再現媒介（例如：民族誌、論文、小說、詩歌；書寫、影音、文物展示、感官體驗），加以傳遞；二則，破解文本的象徵意涵、文本所依附的文類框架，和不同表意方式所承載的文化、歷史、階層、性別指涉等（例如：口傳、神話、歌詠、敘事）。前者是人類學者對「自身」學科的反思以求「再現」他者；後者，則是探索如何「進入他者」的生命世界、感知與認知。人類學家的反思，無法由他人借箸代籌，但如何閱讀他者，卻可借鏡文學研究。胡曉真的新作《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可說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借鏡範例，特別是其所開演的「文學感知力」或稱「文本感知力」。

胡曉真過去的研究，大抵著重在明清乃至民初女性的敘事作品。《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秉持胡曉真對「敘事」的研究根基，但「文學」所指涉的範疇卻更加寬廣，它不僅是一般定義中的古典文學（如小說、詩詞、

戲曲），更包括任何一切藉由文字來表意與喻義的書寫紀錄，如遊記、回憶錄、志書等。她所分析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也由閩秀才女轉向文人儒官，而激發這些創作的地理場域則由人文薈萃的江南，轉向邊境蠻荒的「西南」。西南研究是中國人類學界的經典議題，早在二十世紀初，便有不少學者著力於滇、川、貴、桂、湘西等一帶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習俗，和人種特徵的田野調查，如丁文江、容肇祖、楊成志、凌純聲、芮逸夫等。如果溯及過往的歷史，中國對於西南也有不少記載，最早的首推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他如唐代樊綽的《蠻書》、宋代周去非的《嶺外代答》、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風土記》、清代陳浩作的《黔苗圖說》等。在傳統歷史學乃至人類學研究中，這些著述多半被當成「紀實」的材料加以援用，而胡曉真這本新著最大貢獻就是另闢蹊徑，以其細讀文本的功夫和文學詮釋的手法，具體而微地呈現出文學如何可以既是「材料」，也是「觀看視角」。

本書所分析的文學作品包括：明代田汝成的《炎徼紀聞》，清代陸次雲的《峒溪織志》、陳鼎的《滇黔土司婚禮記》、田雯的《黔書》、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紳的《蟬史》，以及1990年代所發現的三冊明代佚書《大理古佚書鈔》。根據這些作品創作者身份、創作緣由及作品文類，胡曉真將之分成三部分討論，並將文學作品中所必然涉及的三大元素巧妙交織——情感、政治（或權力關係）、作者認同（性別、階層、種族、國族）——既分而述之，又能兼論，胡曉真駕馭文本的功力實屬上乘。

第一部分「情感與世界」，係以陸次雲的《峒溪織志》和陳鼎的《滇黔土司婚禮記》為素材。這兩本書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異」俗多有記載（如，苗族群聚歌舞自相擇配的「跳月」），且多帶有獵奇的色彩。但二書作者的敘事觀點卻各有殊勝：陸次雲是以遊客、外來者的身份，以趣味化的取向，記錄並翻譯異族的聲音、情感、習俗，並以此寄託他對廣闊世界的興趣；陳鼎則是以回憶錄的形式，書寫自己寓居他鄉，在滇黔交界地帶與當地「龍土司」女兒聯姻的個人經驗和生活，他的書寫也因此交織著外來者與當地人的雙重觀點。

相較於陸次雲和陳鼎的「民間」觀點，本書第二篇的「戰爭與統治」，則是透過田汝成的《炎徼紀聞》和田雯的《黔書》，檢視流官的書寫，一種

自上而下、帶有征服、撫順、治理，揉合著志書色彩的觀看視野。只是這兩書並非官修，而是私人著述，也因此在此規範化的方志格局中，依然得見他們如何在訴諸文學喻言，直陳治理經驗之餘，又昭顯他們身為詩人的人文精神，或是對器物的興趣和細部觀察，或是對當地人才的肯定與愛惜。但人文精神之外，詩人也有其內心對「流放」邊境為官的落寞、無奈，甚至抵抗，只是這樣的情思無法在志（治）書的文體中呈現，畢竟，任何文體皆有所「長」亦有所「短」（Briggs & Bauman 1991），而流官對邊境的真實情感，就有可能因為「政治不正確」，而被摒除於志書的文本之外。為能讀出私人志書的「顯」與「隱」，胡曉真帶進了「互為文本」的分析視角，或是流官對西南的其他論著，或是流官對自己家鄉的書寫，以此既補足「治書」的疏漏，也以之來詮釋治書的弦外之音，在胡曉真穿針引線的閱讀中，文學、心理和權力場域之間，既存在著潛在的罅隙，又相互開展，從中，也引出明清文人深刻、多層次的情感與志求。

本書第三部分「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則是將文本書寫的「當下」——作者對時局、時事、時人的紀錄、感懷或回應——放置在更寬廣的時代脈絡、地理空間，和人文想像的透視鏡下審視。在性別的議題上，本書以明初女土司奢香和明末協助鎮壓亂民的秦良玉為例，說明女性、女性的身體、女性的婚姻，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情勢中，產生不同的形象與論述，「歷史」與「性別」看似彼此交互作用，但萬變不離其宗，女性依然是「被注視」的客體，永遠是道德論述和國族（文化）認同的符碼，而政治則是左右論述的推手。胡曉真的分析不禁令人聯想起顧詒剛（1984）分析孟姜女民間故事流變的「層壘說」，而中國婦女的裹小腳之風，自宋而興，又何嘗不是以婦女的身體來象徵華夷之別？！

在地理空間與人文空間的想像上，胡曉真所處理的不僅是明清文人對異域邊城，對海外諸國、西方世界的描寫，更是人與蟲獸之間模糊的界線。夏敬渠的小說《野叟曝言》，描寫的就是儒家失意文人進入廣西苗地所產生的「文化驚異」，並藉由男女之防（如：「趕墟」和「不落家」）來維護華夏文化正統的中心地位，但在維護的同時，也挑戰了儒家教化具有普世性的思考方式。至於屠紳的才學小說《蟬史》，其主要情節是描寫朝廷與非漢民

族（但不限於苗族）或其他國家（如交趾、日本）之間的戰爭。屠紳經常將這些與中國朝廷相對抗的民族與國家比喻為昆蟲，甚至流露出除之而後快的情緒。表面上看，以「異族」為「蟲」的論述可說是漢人「大沙文主義」之作，但在胡曉真文本細讀的推演下，我們看到屠紳如何以《蟬史》挑戰人與蟲獸之間的物種流動性。蟬者，衣魚也，或是作者自喻為依附書頁的蠹魚，或是以此託喻苗人與四邊之國為蟲介牛鬼之流，以此表達屠紳對蟬蟲蛀蝕天朝的憂患意識。但胡曉真進而參照《禮記》和屠紳另一部文言短篇作品《六合內外瑣言》，提出了一個「五蟲世界」的閱讀觀點，指出《蟬史》指涉的實是以「蟲」為主體的世界觀。「五蟲」乃漢人對動物的分類系統：毛蟲之精者麒麟，羽蟲之精者鳳凰，介蟲之精者龜也，鱗蟲之精者龍也，而不屬於這四類者，就是倮蟲，而倮蟲之靈者就是人。以此觀之，人何異於蟲？既無所別，又何庸鄙賤？然而在日常層面，以鄙賤之心、蔑視異族卻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屠紳即是巧妙的運用「蟲」字具有狹義（昆蟲）與廣義（五蟲，即生物）的特性，賦予了這部小說的多聲並存，彼此抗衡的對話關係，以此來翻轉讀者的成見，反思人／蟲、自我／他者，以及不同族群的關係。在胡曉真的解構下，一部極可能被視之為「用夏變夷」的蟬史，轉換視角之後，衍生出「夷夏同化」的解讀面向，精彩至極。此一「多聲並存」的闡析和 Mikhail Bakhtin (1981) 也是依小說而衍生的「眾生喧嘩」和「對話關係」有所不同，堪稱各有意趣。

上述所論及的作品涵蓋極廣，包括遊記、私人筆記、官方史書或志書，乃至長篇小說。書寫者或是文人、遊客、流官，乃至寓居的移民。他們所運用的書寫體裁或有不同，發聲位置也有所別，但他們之間仍有一個共同點，亦即「西南」對這些作者而言，都是「他者」；這些敘事所呈現的也因此是「外部觀點」。為了同時觀照內部音聲，本書也針對90年代，由大理白族學者所宣告在民間發現的三部成書於明永樂至嘉靖年間的筆記抄本進行分析：《三迤隨筆》、《淮城夜語》、《葉榆稗史》，統稱為《大理古軼書鈔》。《大理古軼書鈔》的重要性必須放在所謂「雲南無史」的脈絡下來理解。華夏對雲南的征伐主要有四次：三國諸葛武侯討伐西南夷、唐代天寶年間的南詔戰爭、元世祖的征服並設行省、明初洪武帝出兵平定雲南，而正是在明太

祖平定雲南的戰爭中，不論官方或民間所藏皆一夕盡燬。《大理古軌書鈔》的出現填補了「雲南無史」之憾，不過在利用軌書資料的同時，一些記錄上的矛盾與不合史實之處陸續浮現，因而有了偽書之說。真偽或無法證實，但三種筆記即使不是「真史料」，「偽造」本身也是一種歷史書寫，或者說是對歷史的「模擬」，而模擬有時候比歷史更為真實，因為它的表述空間更容易呈現我們理解歷史的多元觀點（既有外來征服者認同的轉化過程，也有征服者後代移民如何透過傳說來建構認同，乃至被征服者的心靈世界）；同時，也得以呈現藉由觀察、認知、記憶和情感所共同篩選與組構的書寫過程。或許，這也是作者選擇以此作為本書之「代結論」的考量所在，亦即以此一敘事格局來開演書寫主體（作者）和書寫客體（西南）之間的對話關係：究竟是「我觀西南」，抑或「西南觀我」？

當然，「西南」若亦觀「我」，吾人又如何閱讀其所「觀」？這當然不是一個科學實證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直觀性的感受，而強調直觀感受，當許是文學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學之所依止。「直觀」或許是生而知之，但「感受力」卻是學而習之，而胡曉真在《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中所運用的文本詮釋策略，無疑提供了一個習得「文學感知力」的絕佳範式。從中，我們可以歸納出「文學感知力」的四個向度：（1）文本的內向詮釋，即探究作者的內心世界，包括情感、記憶、認同、志求、心靈糾葛，乃至美感的表現與超越；（2）文本的外在詮釋，包括華夷之世界觀與文化觀（性別關係）、世界的遷異（如：異族統治）、西洋地理知識的引入、出版市場的興起；（3）互為文本的閱讀，包括作者不同文類或不同議題的其他著述；（4）不同時代的對話關係（每一著述都是對當代話語、對時代精神的回應）。而此一文學感知或敏銳度（sensitivity）之所以緊要，在於「惟其求諸文學感知，才能在文本的說與不說之間，超越文字的表象」（頁7）。對強調田野考察兼及理論建構的人類學者而言，此一「文學感知力」誠然也是我們「閱讀」文化文本所應著力之處。就此而言，胡曉真的《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雖是以文學為主題，卻也是人類學家不可或缺的案頭書。

參考書目

顧頡剛

1984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歌謠週刊》第69號。臺北：東方文化出版社。

Bakhtin, Mikhail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M. Holquist, ed.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tr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riggs, Charles L., and Richard Bauman

1992 Genre, Intertextuality, and Social Power.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2): 131-172.